

肯认 与 焦虑

——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
意识形态研究

Recognition and Anxiety

——An Ideological Study of
Musical Culture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张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李立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共建项目《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专业人才培养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肯认与焦虑

Recognition and Anxiety

——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
意识形态研究

——An Ideological Study of
Musical Culture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张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 / 张磊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78-3421-5

I. ①肯… II. ①张… III. ①爱略特, G. (1819~1880) —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0279号

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

著 者	张 磊
责任编辑	张 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4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21-5 / I · 303
定 价	28.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批评与 音乐批评：交融与互动

代 序

眼前这部《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是张磊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精心修订之后的著作。其中的艰辛努力和严肃态度，不仅表现在他数易其稿的不厌其烦，更体现在他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的务求穷尽。为了在音乐与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领域能真正有所突破，他不仅关注国内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更是成功地与国外相关的权威学者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譬如，英国剑桥大学的John Harvey教授、英国开放大学的Delia da Sousa Correa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Phyllis Weliver教授，都对他颇具开拓性的研究角度赞赏有加，并针对他研究的具体思路提供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看来，将文学（其最基本单位为字符）与音乐（其最基本单位为音符）这两种艺术形式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固然有趣、有益，但难度却非常人所能想象。一方面，研究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文学文本，培养细致的感受和真实的体会。这感受、这体会，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层面，研究者仍须有高超的批评、解读能力，并付诸于书写。撰写论文过程中，又须找出合适的切入点，并须保证随后的论证结构层次清晰。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须有丰富、完整的音乐素养，既要有音乐本身“触及心魂”的能力，又

应作大量文献研究，捕捉到音乐背后的思想底蕴和人文关怀。最重要的是，他还必须找到合适的、文学与音乐之间的连接点，合理、恰当地将两者的关系阐释清楚，令人信服。只有满足所有这些条件，这个研究才能做得下去，才会有结果，才会有意义。

令人欣喜的是，张磊基本上都能够满足以上条件。一方面，他从本科阶段就对文学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他兼有法学背景，在丰富、细致的感性能力之上又辅有缜密、灵活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颇有问题意识，批评感也极为敏捷、到位。另一方面，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也让人欣羡。他不仅从小接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而且还长期为多家古典音乐杂志撰稿。尤其是三联《爱乐》极有特色、极有前瞻意义的《现代音乐》专栏，便是由他全权负责的。

当然，我之前说过，只懂音乐或只懂文学，对这一跨文化研究都不够。探索音乐与文学的“连接点”才最为关键。幸运的是，作者找到了，那就是在文学文本中把音乐作为一种具有“潜文本”指涉含义的隐喻意象（这部专著便是如此），或者在音乐文本中挖掘其声响背后的叙事（文学）含义，并将其剥茧式地层层分析出来。而且，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指出”阶段，而是将其融入到对意识形态、政治等大理论视野的探讨之中，显得尤为有深度和力道。

迄今为止，在辛勤的探索过程中，张磊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已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即将出版两部（包括眼前这部）专著，还有一部专著正在整理之中。他还积极、广泛地参加了多次相关领域的国内外会议，甚至还利用自己的办公室开设了“文学与音乐跨文化研究中心”，抽出自己的周末时间指导学生在这一领域的思考和论文写作，并为学生们正式开设这门课，选课学生近百人。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我对这样一个安心做学问、乐于做学问的年轻学者的真心欣赏和敬佩。而且，作为看着他长大、成长（学术上和心理上）的老师，看到他的努力、他的成功，心中尤其

多了一份欣慰、一份感慨、一份期盼。真心祝福他在学术的路上越走越好，早日、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永远相信，认真阅读、思考书本人生、现实人生的人从来不会独行，也不会孤独，因为总会有一双默默关注他的眼睛。一分耕耘之后，总会有一分收获。

李 立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2012年1月11日

摘 要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任何对英国维多利亚主流音乐文化的审视都会聚焦在它的矛盾性之上：一方面，它回应着当时形形色色、近乎狂热的进步话语，有开放性的一面。不论是它被传播的广泛性、还是被理想化的程度，都是前所未见；另一方面，它也是隐蔽的，背后隐藏着另一套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微妙的方式警惕着、打压着它任何可能的“语义过剩”。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性：既希望通过音乐“民主”的表象作出超越贵族阶级的姿势，又对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心存疑惧，担心他们会威胁到自己新建的音乐文化霸权。

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现实主义作家乔治·爱略特在音乐政治观上也无法避免阶级身份带来的影响，呈现出某种复杂性、矛盾性。一方面，她对当时的主流音乐、音乐家极为尊崇，高度肯认其权威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合谋；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过度理想化的音乐背后所隐藏的各种潜在的颠覆因素，不可避免地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严重的焦虑。

本文在法国学者阿达利“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关照下，主要从音乐“理想化”和“世俗化”两个角度入手，探讨爱略特小说中涉及到的音乐政治之一体两面：中产阶级对音乐过于理想化的建构、音乐在工商业社会中的四种自我解构。

本文将重点分析爱略特三个代表性音乐主题的小说文本：《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丹尼尔·狄隆达》。第一

部作品以宗教音乐（主要是赞美诗）为核心主题，塑造了以黛娜为主的四个宗教音乐形象，并通过对其权威性逐一的消解，戏剧性地再现了音乐布道在世俗化泛滥的乡村面临的危机；第二部作品以田园牧歌式音乐为核心主题，集中塑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音乐形象麦琪，以她与菲利浦、斯蒂芬等人充满世俗化色彩的音乐互动方式构成叙事张力，揭露了田园牧歌式音乐的伪田园性；第三部作品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主题，塑造了“超验”的“伟大”音乐家克莱斯默这一形象，并通过反讽和互文这两种叙事手段，打破了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不食人间烟火”的幻象。

由此可见，爱略特在其小说中对音乐和音乐人物的描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深刻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政治美学化努力的矛盾性、复杂性，其对文化进行积极建构的同时已经隐含了解构和颠覆的一面。

关键词：乔治·爱略特 音乐文化 意识形态

Abstract

Seen today, any assessment of Victorian mainstream music as a cultural signifier inevitably verges on its immense contradic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desperately echoes the prevailing discourses of progress, be it in its promotional fervor, or in the unprecedented extent to which it is idealize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paradoxically looms large another set of extremely conservative ideologies that subtly cautions against and suppresses any semantic extra in it. This baffling phenomenon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the self-contradictoriness within the dominant middle class, which aspires to make transcendent gestures with “musical democracy”, and yet harbours profound fears of any potential threat from other classes to its hegemonic position in music.

As a typical elite intellectual, George Eliot, the famed realist novelist falls short of escaping similar contradictoriness in her stances in musical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she pays great homage to music and music masters and affirms their authority, thus forging complicity with the middle class’s hegemonic id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she never fails to be aware of the subversive potentials of music itself, thus having severe anxieties for the justifi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is high-blown cultural form.

Highly inspired by Jacques Attali’s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and Terry Eagleton’s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advantage of two useful entry points—“ideal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two sides of Victorian musical politics—the dominant middle class’s idealized construction of music

runs alongside the four types of self-deconstruction within music itself in a secularized society.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this dissertation will highlight three of Eliot's musically informed texts, namely *Adam Bede*, *The Mill on the Floss* and *Daniel Deronda*. The first book takes religious music, especially hymns as its central theme. Through portrayal of four religious musicians, especially Dinah and their loss of musical authority, Eliot dramatically represents the crisis of musical preaching in the increasingly secularized countryside. The second book centres itself around pastoral music. Through vivid descriptions of Maggie, the quintessential pastoral musician and her revealing musical encounters with middle-class males like Philip and Stephen, Eliot displays the pseudo-Paradisaal nature of pastoral music. The third book focuses on classical music. Through lavish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cendence" and "greatness" of Klesmer, a master composer and the subversion of his superiority by means of irony and intertextuality, Eliot lays bare the earthly reality of classical music.

In conclusion, Eliot's obsessive concern with music and musicians in her novels goes far enough to show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s in Victorian middle class's appropriation of music for political purposes—any attempt for its active construction is invariably followed by much potential subversion.

Key Words: George Eliot, musical culture, ideology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1
1.1 音乐与小说研究	2
1.2 爱略特小说与音乐	6
1.3 爱略特批评史	13
1.3.1 主题研究	14
1.3.2 形式研究	18
1.4 爱略特音乐批评史（国外）	19
1.5 爱略特音乐批评考略（国内）	28
1.6 本研究的切入点及思路	29
第二章 建构的焦虑：爱略特小说中音乐的社会背景	32
2.1 主流中产阶级对音乐文化的积极建构	33
2.1.1 类型的定性：排他式的道德视野	33
2.1.2 理想化的书写：精英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	34
2.1.3 改革式的论调：道德家和教育家的极力鼓吹	36
2.1.4 “进步观”的思维：科学话语的挪用	37
2.1.5 日常化的劝导：大众传媒的渗入	39
2.1.6 商品化的符号：转向室内的消费	41
2.1.7 体制化的生产：专业音乐机构的规训	43
2.1.8 地位和财富的景观：公共音乐厅的崛起	44
2.2 维多利亚音乐的隐性颠覆	46
2.2.1 文字“编辑”的焦虑：对歌词的过分依赖性	46
2.2.2 视觉表演的危险：身体的在场	47

2.2.3 感官取悦的隐忧: 过度的可听性·····	49
2.2.4 思维混乱的恐慌: 情感体验的多义性和流动性·····	50
第三章 模糊的边界: 宗教音乐表征与意识形态·····	52
3.1 合谋与悖逆: 爱略特的宗教音乐政治观·····	54
3.2 音乐布道的危机: 《亚当·贝德》·····	56
3.2.1 神圣与世俗的划界: 宗教音乐优越性的建构·····	56
3.2.2 优越性的解构: 四个宗教音乐人物·····	58
第四章 去魅的神话: 田园牧歌式音乐表征与意识形态·····	74
4.1 肯认与质疑: 爱略特的田园牧歌式音乐政治观·····	76
4.2 牧歌式歌唱的窘境: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78
4.2.1 理想化田园与现实乡村的混同: 田园牧歌式 歌者麦琪重要地位的建构·····	78
4.2.2 麦琪身份的瓦解: 五个视角·····	79
第五章 超验的想象: 古典音乐表征与意识形态·····	98
5.1 认同与矫正: 爱略特的古典音乐政治观·····	100
5.2 古典音乐话语权威的挑战: 《丹尼尔·狄隆达》·····	104
5.2.1 “权威”的评判力: 克莱斯默“伟大性”的 建构·····	104
5.2.2 克莱斯默权威的颠覆: 反讽与互文·····	109
第六章 结 论·····	117
参考文献·····	120
1. 英文部分·····	120
2. 中文部分·····	139
后 记·····	142

第一章 概 论

不论是音乐还是文学，都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它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展现其复杂多样的声（色）谱，而且本身亦参与到所在的社会现实当中，进行重要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与社会现实产生一种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对话关系。因此，研究一个时代和社会，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这样一些文化表征（符号）。

诚然，在反映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音乐和文学这两种文化表征依赖的基础文本、借助的手段、产生的效果是有所不同的。

和文学（以字符组合而成的句段为基础文本，由此产生某种具体的文字效应、实现文化指涉）不同，音乐的基础文本是由标有音高、音程、节奏、音色等记号的各个音符组合而成的总谱（sheet music），它需要借助演奏（唱）家对其演绎，由此产生某种具体的音响效果。这种音响效果便折射着使其生成、由其参与的大文化背景、思想氛围。

譬如，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虽然选用相似的剧本、运用近似的旋律惯例和和声系统、都采用分曲结构，然而它们却产生不同的效果，给我们留下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印象。具体来讲，就是：莫扎特的音乐更加圆满、复杂、内敛，而罗西尼的音乐则表现出他对机械性音响、突兀的效果，以及华丽的音乐表层的偏爱。换言之，莫扎特将听觉注意力转向音乐进行的核心——如节奏、和声和旋律；罗西尼的音乐

中，人们会更加注意到细节——如装饰音、力度变化，以及配器的精致和幽默感（夸张的、毫不掩饰的玩世不恭）。

莫扎特、罗西尼这两部音乐作品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不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所指涉的社会语境、文化思想之差异：前者作于18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甚至体现出共济会的特定追求，反映了确信人类能战胜人与人之间种种对抗的“存在的和解”（马尔库塞语）这一（音乐）论点和“理性”的（音乐）论证方法。而后者作于19世纪早期，体现的仅仅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占据优势地位的观念和心态，也就是“反启蒙”：理性和激情应该在18世纪走过了头的立场上撤退，唯一可行的态度是一种受到调节的怀疑主义。

然而，音乐和文学这两种文化样式也并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它们彼此之间的交融由来已久，尤其是将音乐适当地移植到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和诗歌）之中的互文的呈现方式，往往为文学大师们所采用。在这些作品中，两者的融合和互文的指涉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最大程度的合力，更加动态地与社会文化进行对话。

事实上，将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移植到文学土壤之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人类最古老的诗歌——最早的文学样式（genre）里，便充满了音乐的意象，诸如风吹竖琴产生的音响、吟游诗人的引吭高歌，等等；而且，诗歌的节奏、韵律与音乐的节奏、旋律亦有相似之处。这个音乐—诗歌传统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得以发扬光大，这个时期的诗歌大多可以配上琅琅上口的曲调加以演唱。

1.1 音乐与小说研究

和诗歌相比，小说这种相对来说较新^[1]的文学样式与音乐之

[1] 伊恩·瓦特将小说的产生与18世纪中产阶级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可见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说“较新”。

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密。音乐在其中占据一定话语权的小说，从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那里便开始出现了。随着小说的逐渐发展、成熟，音乐在其中的话语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期前后，简·奥斯汀（Jane Auste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乔治·杜莫里哀（George du Maurier）、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一大批优秀的小说家不约而同，都自觉不自觉地吧音乐意象引入到自己的小说中。

把音乐移植到小说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适当音乐的“嵌入”可以很好地为小说的形式服务，原因有五。

第一，小说中的音乐可以像电影中的配乐一样，作为有用的背景音乐（incidental music），有效地营造、烘托一种特定的气氛、特定的情绪、特定的“音场（soundscape）”，其“诉说”的效果常常要远胜于人物间的文字对白或者叙述者从外部所做的直接叙述，可谓“此时无言胜有言”。譬如，亨利·詹姆斯在受爱略特《丹尼尔·狄隆达》影响后所写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这一小说终稿中，让梅尔夫人演奏的是舒伯特，而不是初稿中的贝多芬，就是为了借用舒伯特音乐中的特质营造一种虚假的温馨感、室内感，以达到欺骗天真的伊莎贝尔·阿切尔之目的。

第二，音乐中常见的曲式，即奏鸣曲式（sonata form）——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部，同样可以被小说家模仿，作为其小说情节展开的模式（pattern）。譬如，托马斯·曼著名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üger）》便采用了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首先呈示了汉斯·汉森和英格波·荷尔姆两个对克勒格尔极为

重要的主题人物；展开部则通过克勒格尔与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的对话，详细地说明了这两个主题人物对克勒格尔性格、人生的重要意义；再现部则通过克勒格尔旧地重游，回想起与汉斯曾经共同散步的情景，再现了第一主题；在接下来的几天，克勒格尔在小店的舞会中又再次见到了英格波，再现了第二主题；最后，克勒格尔给丽莎维塔的信则作为尾声，总结了整个故事。

第三，音乐的复调形式——“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却仍保留各自的独立性”（昆德拉，《小》92），在“对话体”小说（或者叫作“复调小说”）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前苏联理论家巴赫金在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便发现了这个重要特征，而在乔治·爱略特等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家的作品里，也常常出现“众声喧哗”的情景。譬如，《米德尔马契》一书的两条主线：多萝西娅失败的婚姻和理想，与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失败的婚姻和事业，便在对比、对称、平行和重复的过程中，互相对话、评价着（包括感叹和同情），形成一种二声部的“共鸣”，但与此同时，二者又彼此相互独立、不互相交缠。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复调”形式。

第四，音乐（常常是乐谱或某种乐器）可以作为调节叙事节奏、推动情节发展、或者设置悬念的重要线索，或者作为一个不断重复、变奏的“主题动机（leitmotiv）”，使一些看似结构散漫的作品变得有内在的结构性。譬如，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被想与麦琪约会的斯蒂芬当作借口的、巴尔富的《阿都瓦的女郎》乐谱，奥斯汀《爱玛》中引发爱玛不可靠叙述的简·费尔法克斯的钢琴馈赠之谜，或者萨克雷《名利场》中爱米丽亚失而复得的钢琴的馈赠之谜，都是很好的例子。

第五，小说家有时候会把某种特定的音乐和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性格联系在一起，成为辨认其身份的“主题动机”、“固定乐

思”^[1]。通过这些人物亲自演奏或者欣赏的音乐，读者便可以试图判断演奏者或欣赏者内在、真正性情的一个重要方面。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到的“扁形人物”（用音乐的术语来讲，就是“始终固定在一个调性上”），便是最好的例子。譬如，柯林斯小说《月光宝石》里的反面人物福斯克伯爵，代表他的主题音乐便是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罗西尼擅长在歌剧中创造“音乐的风暴和吵闹的（逐渐增强的声音的）顶点”（Rahill, 126），而福斯克在狞笑着自弹自唱罗西尼的《摩西在埃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作品时的表现则达到了类似效果，让听者（尤其是劳拉）有一种巨大的威胁感和压迫感，清楚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某种邪恶和阴暗。福斯克的触键能让钢琴震颤、让茶杯拼命地摇晃不止，而他如洪钟般的低音、在踏板上踩出的重音更加深了他的恐怖形象。

另一方面，音乐亦可以很好地为小说的主题服务，原因有三。

第一，作为一种不可充分翻译、不可直接说出，只能以抽象、隐喻的方式去体会的“绝对语言”，音乐可以为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提供便利，成为其表达隐密思想、情感的手段，尤其在文字语言表达不合适的场合。譬如众多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用音乐“合法”调情、求爱的场景，或者如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格雷用音乐这种特殊的“暗号”来对特定的对象“说出（articulate）”自己隐藏的同性恋欲望，只有特定的对象才能成功“解码”。

第二，乐器的占有、音乐的类型、音乐的演奏场所都可以用来指涉社会差别，反映出演唱（奏）家和听众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譬如，萨克雷《名利场》中钢琴的得失标志着主人公社会地位的浮沉，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殷实的布鲁克先生才有财力和精力去维也纳现场听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歌剧，而且这些人听的一般来说一定是歌剧。

[1] 前一个词来源于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而后一个词更早些，来源于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不论是“主题动机”，还是“固定乐思”，都是作曲家用来把音乐元素“统一”起来的一种手段。两位作曲家之所以能提出这两个概念，都是受了当时文学的影响，而他们的这两个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学，“主题动机”一词已经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